

傅斯年(1896~1950)学术思想中的‘科学主义’及其含意

崔恩珍

一、引言

推动中国近现代学术形成的最大催化剂之一当属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的反应。洋务运动时期以后，西方科学成为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武器，“科学救国论”就此形成。初期只是停留在引进技术的层面，此后这股“科学救国”的热潮便一发不可收拾，通过废除以前的制度，大兴教育实现了科学的制度化。这成为了五四运动时期以后，西洋文化的核心要素和定要习得的一个要素。此后，在有关科学和玄学的争论迟迟不下之时，“唯科学主义（scientism）”脱颖而出成为了大势所趋。简言之，唯科学主义是一种对科学的技术性成功抱有敬畏心，并把科学合理性视为唯一要义的态度。¹

虽然争议之中也有人提出了“科学救国论”所存在的问题，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科学确实在中国落地生根，得到了普及。然而，中国大部分的人对实际科学在中国能否得到发展持怀疑态度。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在传统科学还屹立不倒之时，唯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西方化被过分强调，传统被无条件排斥，这本身就是中国科学主义的特征。² 本报告并不是论证该科学主义的哲学含义和其具体的差异，而是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傅斯年来阐明当唯科学主义被视为中国国家建设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的思想工具时，其暴露出的工具理性问题。

唯科学主义与科学态度的扩散以及基于此的现代国家建设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科学救国理念中还囊括了今天的科学兴国价值观，把科学的发展认为理所当然之事。而且，唯科学主义无关政治思想派系，已被全盘接受。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通过大

¹ 有时也意味着把‘科学方法’视为世界上所有领域（生物界、社会、物质界、心理界），甚至与科学毫无关系的领域也要把科学应用进去的极端科学万能主义。韩城九，「(吴稚晖)的科学主义思想观」，《韩国哲学论集》，47集，2015，p.144

² D. W. 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Y.: Biblo and Tannen, 1971.

量的舆论宣传活动，试图与吴稚晖和丁文江一道把唯科学主义进行体制性的理论化，对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他的这些作为并没有得到关注。有关傅斯年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其历史学家、科学史学派的身份或者他思想中的唯物科学主义为切入点而进行的。鉴于相关资料仍在收集当中，人们对他的思想或者活动中出现的矛盾面众说纷纭，因此有必要思考其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意义。³ 尤其是，傅斯年的相关研究试图把傅斯年的研究中体现出的他与传统学问之间的相关性作为研究重点，重新审视其研究。

⁴除此之外，还试图通过时论性研究从中国自由主义中的唯科学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当中，探索包括傅斯年在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局限性。⁵

二、学术促成“社会改造” - “唯科学主义”信念的形成

1. 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

傅斯年（字孟真）被认为是五四运动时期实现科学、民主、社会改造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于山东西北部的聊城，11岁时就通读了《十三经》并接受了私塾教育，可以说接受了十足的传统儒家经典教育。因此，傅斯年在1916年考入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与章太炎和黄侃成为了当时北京大学名极一时的代表性学者，备受瞩目。⁶

不仅如此，傅斯年还接触到了与西方文化相关的学问。他为了接受旧制度废除后的新式教育，1908年在父亲的弟子侯雪舫的帮助下，进入了天津府立第一学堂，与西方的文化结缘。1917年，蔡元培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他邀朋友共听胡适的课后遂进入了文化革命的阵营，又因其精通英文，大量耽读了西方书籍。因傅斯年除深受胡适影响以外，还受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所以对唯物史观一直持反对态度。然而，他接受了强调劳动神圣的“劳工神圣”思想，主张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平等，并应施以此策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1918年夏，在《新青年》杂志的影响下，与罗家伦共同创办了《新潮》杂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五四运动时期学生领袖。《新潮》杂志创办的宗旨中指出：“应把中国社会不恰当的学术

³ 雷颐，「傅斯年思想矛盾试析」，《近代史研究》，1991.；认为傅斯年的主要思想是：传统士大夫思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并对其进行了列举分析。朱春华，『傅斯年改造思想略论』，河南大学 硕士论文，2002. 5, p. 41.

⁴ 李广臣认为傅斯年对中国传统学问的影响，使得人们开始追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均衡。『傅斯年政治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 硕士论文，2008. 5.

⁵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年 第1期，p. 3.

⁶ 杨纯刚，「傅斯年：徘徊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学者」，《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12.

改造成西方学术模式”，体现出了其对学术改造的热忱。⁷ 他在《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个性，已经被奴隶道德所绑架；而西方知识分子不仅个性十足且具有独立判断的标准，该标准就在从西方学术模式当中。⁸ 与此同时，傅斯年积极地接受了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的超人思想。由此可见，超人思想与其精英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对可独立判断的个人问题十分感兴趣。⁹ 这可以理解为，傅斯年认为大众之所以道德沦丧，都是因为不爱好学术，社会改造是普及学术的基础。

因为只有在具有独立个性时，才能进行改造，所以傅斯年非常重视语言对思想的影响，并主张使用西方化的白话文。同时傅斯年认为，应该成为以合理性自由为前提的近代西方人，而西方人即是富有科学精神的个人。

傅斯年还认为，中国社会因不具备有机体性质，已经走向了衰败。他接受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即，社会和国家就如同生物一样，是高度整合的有机体。若想形成该有机体就要通过文学来培养平民精神。而且，通过这种改良的方式，社会改造构想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结束后，再次重整旗鼓占据了一席之地，并在 1919 年胡适和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争论之中，依然因胡适而“发扬光大”。他试图通过学术方法来实现能培养世界市民意识的社会改造，而该学术方法就是西方学术方法——科学。

2. 西方留学经验和学术救国

1920 年，为实现社会改造急于理解西方学问的傅斯年，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傅斯年认为，心理学是实现社会改造的一大“利器”，他还同时广泛涉猎了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即历史、文学、政治学等一些学科。傅斯年在与科学息息相关的学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是为了想从科学中寻找社会改造的答案。然而，傅斯年在心理学当中并没能得偿所愿，所以他在 1923 年 9 月转学去了德国的柏林大学。当时的英国正笼罩在经济萧条的阴影之下，暴露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这使傅斯年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重性。¹¹ 傅斯年之所以会转战打德国柏林大学，除了因为陈寅恪和俞大雄等中国同仁同在柏林大学求学，还因为他想习得柏林大学闻名于世的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等相关的物

⁷ 「新潮發刊旨趣書」，1919 年 1 月 1 日，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 7 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pp. 80~81.

⁸ 「中國學術思想界之基本謬誤」，『新青年』，4 卷 4 号，1918. 4. 15.，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 1 卷，湖南出版社，2003，pp. 21~22.

⁹ 雷頤，「傅斯年思想矛盾試析」，『近代史研究』，1991，pp. 201~205.

¹¹ 朱春華，2002. 5，pp. 18~20.

理学以及语言文字比较、考古学等科学学问。¹²

当时，德国建立了帝国，国家主义色彩浓厚。傅斯年对民族主义盛行，更强调国家在经济上的调控而不是英美自由经济的德国予以了积极地评价。他认为英国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个人功利主义思想上的，而德国则重视国家和民族的自由，国家干预也让德国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迅速恢复了国力。傅斯年在德国的那段时光里，越来越感到了国家的重要性，并受到了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而且，德国基于浪漫主义传统，显现出了非常典型的民族主义特征——非理性因素和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虽然初期的德国具有重视民族个体性和主张多元主义的积极一面，但是渐渐的，德国却出现了神秘崇拜德国这一有机体的国家主义特征。德国为了能够顺利启动国家有机体，学校异常重视有关国家和民族的教育，并试图通过教育来创造国民性。¹³ 认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能够改造社会的傅斯年对德国在教育 and 学术上的干预给予了积极评价，并认为中国也应该像世界市民之一的德民族一样建立有机国家。

然而，德国的国家主义特征和教育体系并没有被所有留学生接受。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张君励，就不像傅斯年那样积极肯定德国的民族主义。张君励指出，德国的民族主义还具有暴力性，应该用人类普遍的道德和法律来约束民族主义，尽量避免由此而发的国际战争。而且他还持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呼吁对中国的学术传统抱有信心。然而，傅斯年却认为，拿大汉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及优良的民族性来鼓励中华民族不要灰心丧志，大力鼓吹自信心与日耳曼民族主义大同小异，应从学术方面入手，用西方科学重组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文化，谋求全面的西方化。对于傅斯年来说，西方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于科学。

三、学术和教育中出现的唯科学主义

1. 学术机关的专门制度化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张君励和丁文江的争论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科学和玄学的对立。此后，唯科学主义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傅斯年也与其合流。¹⁴ 以“海归派”为首设立的科学院也是为了用科学来取代仁义道德等内在价值。然而，西方科学却通过资本主义社会

¹² 马亮宽，「傅斯年的自由社会主义思想论析」，“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2007. 11, p. 20.

¹³ 李广臣，2008. 5, p. 39.

¹⁴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獨立評論』，1936. 2. 16.，歐陽哲生，『傅斯年全集』第5卷，pp. 471~479.

的制度化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把通过非人格化的官僚制度以及对各阶层进行成本计算的会计制度，追求制度上的合理化作为目标。而且，又可视为企业管理方式的该制度化又把通过脱价值和脱政治来提高效率和控制能力作为目标。因为该目标无关乎自由宪政体制、权威主义或者整体体制，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体制，所以在当时并没有成为被批判的众矢之的。¹⁵ 因此，可以说脱政治理性的合理化原来就与唯科学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傅斯年也对此深信不疑并非常重视这种制度化的效率性。

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体制已经和国际文化体制进行了相互交流，学问上也开始出现等级化端倪，所以傅斯年认为应该让坚定不移的制度和专门性作为社会改造根基。当时的史学代表人物是由主张继承传统史学方法的章太炎、钱穆、柳诒徵等人，他们反对傅斯年对中国历史研究进行西化的主张。然而，章太炎等人的学问研究并不是被世界级科学实证研究的研究。因此傅斯年着重强调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对实现普遍主义史学的重要性。为此，他创办了以“消除国家差异，继承西方汉学（东方学）学术”为宗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这可以视作是为应对当时等级化学问世界的一剂良方，是傅斯年追求符合西方标准的制度合理化的产物。史语所的创办宗旨是：“组建致力于纯粹客观史学和语学的企业”。也就是主张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经营史语所。¹⁶ 他邀请了佩里奥等西方汉学家和“海归派”专家研究人员共同创办研究所，也是为了追求西方汉学的研究方法和体制。他表示，“在近代复杂的社会中应该具有专业性的能力，研究所也应该成为能让大学具备专业能力的地方。”¹⁷

能够充分体现傅斯年学术思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虽然标示出了他与清代朴学（训诂考据学）的继承关系，也充分体现出了其推崇德国的学术体制的特性。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学术并不是学问，而是一种以人为单位的研究，即家学方式。而且，他主张应该建立运用西方科学方法的学问机关，为追求学术自由应采取教授治校的政策，并对教育经费也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立也是受到了德国的洪堡(Humboldt, Karl Wilhelm Von, 1767-1835)学派的影响。“普鲁士的教育当局提倡洪堡大学教授应该做研究，在整理教育和学问的过程中，学术风气也出现了变化，柏林大学中也出现了该风气。他提到，当时欧洲的东方学相关的最大汉学家——德国的米勒(F. W. K Mueller)非常努力地教授学生，而相反佩里奥却完全是自我主义者。由此可见，教学与做学问很难做到一致。¹⁸ 而且，还多次提及洪堡(Wilhelm

¹⁵ 許紀霖，上述论文，p. 314.

¹⁶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傅斯年全集』第6卷，p. 9.

¹⁷ 「中山大學民國十七年屆畢業同學錄書」，『傅斯年全集』第5卷，p. 4.

¹⁸ 「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1949年10月1日，『傅斯年全集』第5卷，pp. 97~98.

Von Humboldt)提出了：“应弘扬军国主义，重建柏林大学。”¹⁹

傅斯年主张学术机关要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与其同流合污，但这并非易事。²⁰ 而且在研究所制度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分歧，顾颉刚单飞设立了北平研究院，并与柳诒徵与钱穆反目。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巨大的分歧，与傅斯年对学问制度化的认识脱不了干系。1926 年末，傅斯年听取了朱家华的建议后回国，随即经营了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而且因为其与朱家华的个人交情，傅斯年获得了政府的支援继续经营研究所，并被以为学霸，这一切都与傅斯年对制度化信念不无关系。²²

除此之外，傅斯年还主张聘请专家进行集团性的合作研究，研究所正好就是能把其主张付诸实践的组织。中国的大学认为，当时中学的课程很难以德国式的讲座为中心进行，大部分学校的课程都是以美国式的独立学科为主构成的，所以研究所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²³ 史语所为进行集团研究逐渐走向了组织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学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了世界级水平的学者，学术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²⁴

2. “科学史学派”形成

傅斯年于 1928 年撰写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近代科学的方向。他在报告中说明了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的意义，并写道：“之所以设立历史研究所，是因为我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语言学都是同等且属同类事业。”²⁵。除此之外，语言学也采取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正在取代章太炎之类的研究。²⁶ 这也是其被叫做科学史学派的原因所在。傅斯年在 1923 年开展国史整理运动之时，提出了“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理念，并批判了清代汉学和国史整理的疏证。还指出了国史学派和北京大学国学学问主张的国史整理运动以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两大集团，并没有充分考虑西方学术化的情况，批西方的汉学把中国文明视为衰败的文明。

傅斯年深受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傅斯年还采用了德国兰克学派伯纳德林(Ernst Bernheim)的纯粹客观历史学研究。即，收集史料并用科学方法考证文献，使用客观的历史叙

¹⁹ 「中國學校制度之批評」，1950 年 12 月 15 日，『大陸雜誌』，『傅斯年全集』第 5 卷，p. 188.

²⁰ 歐陽哲生，「傅斯年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初期研究工作」，布占祥 馬亮寬 主編，『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²² 翁有為，「吳宓、陳寅恪與胡適，傅斯年之關係——以『吳宓日記』為中心的考察」，『史學月刊』，2014 年 11 期；王晴佳，「陳寅恪，傅斯年之關係及其他——以臺灣中研院所見檔案為中心」，『檔案研究』，2005. 11 期.

²³ 「臺灣大學與學術研究」，1949 年 10 月 1 日，『傅斯年全集』第 5 卷，p. 105.

²⁴ 朱发建，上述论文，p. 23.

²⁵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七年度報告」，p. 9.

²⁶ 焦潤明，上述论文，p. 51.

述。兰克的史料实证历史学使中国历史学挣脱了封建时代的宗教或伦理的束缚，可以说是非常进步的。而且，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用具有伦理性的文章去著述通史，其主张史科学。这都是为了批判当时强调伦理道德的学派，与考证学科划清了界限，强调应灵活运用包括金文以及甲骨文在内的史料。换言之，傅斯年反复强调了若想发展中国的历史学，必须对西方进行研究与学习并扩大史料的范围。²⁷ 而傅斯年与十分重视史料的王国维与顾颉刚的不同之处在于，傅斯年更偏向制定与史料相关的原则来学习西方学者们的成果。为了系统性的整理并证明这样的史料，他追求史学与地质、地理、考古、生物等科学方法的融合，并形成了科学史学派。然而，西方却认为兰克的历史学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史料整理已经成为了历史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傅斯年为了用科学实证历史学代替传统史学，制定了比之前更大的目标。²⁸ 除此之外，傅斯年曾多次反复提及与国家存亡相关的史学或者教材能够代替传统史学的道德判断，并强调其重要性。²⁹ 这其实也与德国的兰克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傅斯年直到1945只主张实证而排斥理论和解释的原因可能是为了区别与当时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史观派。换言之，正式因为事无巨细地探求并进行比较的方法被称为科学方法，所以其还被称为新考证派。但是，从其自称科学派并进行观察这一点上来看，反而凸显出了唯科学主义。

30

3. “中医西医”之争—科学的普遍性

傅斯年科学主义的特性在文化上也有所体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新生活运动，在鼓励复古文化的分为中，大量肯定中医的论文出现。对此，傅斯年于1934年3月5日在《大公报》中写道：“接受新式教育的人怎么能仍讲求中医的五行、六气！提倡近代化的人怎么还能用政治和社会的力量保护中医！”³¹ 并批判了人们至今还不具备科学常识，本应与世界水平相符，却仍然不能判断是非。他主张，医学是世界性的、普遍的知识，国家应该积极推进废除中医的政策，若违反规定应课以重税。³² 他的此番主张可能与优生学性认识有很大联系。所谓的优生学指的是，国家具有把人分为开化和非开化人，并以接受教育的新家庭为基础，培养优秀种族的职责；国家还应该禁止患有遗传性精神病的人、罪犯、性病患者、无法自理的人

²⁷ 歐陽哲生，上述论文，p. 51.

²⁸ 劉俐娜，「試析傅斯年史學思想的現代性及其局限」，『傅斯年與中國文化』，p. 64-66.

²⁹ 「閑談歷史教科書」，『教與學』，第1卷第4期，1935.10.1.，『傅斯年全集』第5卷，pp. 61~63.

³⁰ 焦潤明，上述论文，p. 45.

³¹ 「所謂“國醫”」，『大公報』，1934年3月5日，『傅斯年全集』第5卷，pp. 431~463.

³² 「所謂“國醫”」，p. 432~434.

生育。而且，他还批判了基层社会中无法普及科学的教育体系。³³

对此，中医赵寒松于 1935 年 8 月 13 日在《大公报》上批判傅斯年的言论称：“大概傅斯年接受的是美式教育……中国人若都与傅斯年一样，中国立国精神就会被从根本上动摇，门户大开和机会均等将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以陈泽东为代表的天津中医工会也于 8 月 18 日通过《大公报》批判傅斯年是在侮辱中医，并表示一定要保护经几千年历史流传下来的遗产——中医。然而，傅斯年也不甘示弱，同样予以回击，中医就是不符合近代科学和近代教育，这是史实。而且近代科学和近代教育理所当然的应该被无条件接受。他表示：“学校在教授知识时应按照逻辑要求，并要有科学系统……如果在学校学习了物理或者化学的话……绝对不可能依赖于这种玄谈式的汉医。”³⁴ 并批判中医只不过是一种国粹性质的议论。而且，傅斯年还慨叹，没有确立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国家根本就称不上什么文明国家。在中医和西医之争中，傅斯年的唯科学主义就出现了。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学术缺少怀疑精神和科学精神。³⁵

四、结语

本报告从科学绝对化的角度出发，试图把唯科学主义简单化。这样的唯科学主义强调的是实证主义与理性，与近代社会文化相连接作为前提，审视了傅斯年思想的唯科学主义。可以看出，他一生从未放弃过唯科学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只有具有科学素养，通过教育才能够实现社会的近代化。因此，他认为专家和行政官僚是立国之本，国家的作用举足轻重。以唯科学主义标准来审视傅斯年时，能够理解他与自由社会主义相冲的一部分。所以他一直试图用价值中立制度的发展来把基于科学知识建立起来的国家的体制形成合理化，并认为这也是国家走向富强的一个方法。国家富强要靠科学技术、合理的刑法、官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而为了具备上述条件，把理性工具化一直认为是西方近代社会的特征。傅斯年的唯科学主义特征中也有这样的理性工具化的特点。**笔者认为**，为实现近代自由和价值，对丧失自由和价值的理性工具化课程的思考不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关系。

³³ 唐小兵，「傅斯年與 1934 年的國醫，西醫之爭」，『書屋』，2005，p. 18.

³⁴ 「再論所謂國醫」，『獨立評論』，1934 年 8 月 26 日，『傅斯年全集』第 5 卷，p. 438.

³⁵ 唐小兵，上述论文，p. 20.